

纪事三：师生行军过秦岭

战士远程行军保家卫国史不绝书，高校师生千里行军却是十分罕见的。临大刚在西安立足，太原沦陷，潼关作为关中的门户，连续告急。古都西安上有敌机叠袭，近有炮火进逼，安全形势受到严重威胁。1938年3月2日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主任蒋鼎文，基于“为维持学生的学业起见，及为国家根本的教育事业起见”，命令西北临时大学南迁汉中。从西安到汉中，要翻越秦岭。秦岭自古有“峭如削”的险峻、“不容脚”的难行，但近2000名的师生，以行军的组织、乐观的精神、战斗的豪情，翻越崇山峻岭，行走褒斜古道，开进汉中盆地重续弦歌，谱写了中国大学史上的长征之歌。

一、西行还是南移——西安临大的迁校之议

关于三校再迁问题，黎锦熙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记述，“初议迁，所向不能决。有朋聚谈，余谓若具远略，宜指西北，度陇屯甘凉，趋新疆，此为左宗棠路线。若避入蜀，是为唐明皇路线。迁陕南，是为唐德宗路线。仅少西移，则为杨贵妃路线矣。”黎锦熙先生的这一段话，透露出在迁校的动议上，在临大师生中应该有四种意向性的意见。

先说第一种路线，继续向西北远迁，其选择范围很大，甘肃、青海甚至新疆都可考虑。3月1日，西安临大曾派李书田、袁敦礼、张汉文三人到甘肃、青海两省的天水、兰州、西宁等地，进行社会文化和自然资源的调查，就担负有校址勘察的使命。3月9日的西安临大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曾有这样一段记录，“李委员书田、袁主任敦礼、张主任汉文，自天水来电报告印象颇佳，本校因时局紧张，已复电请其先往南郑布置，后又接到虞电一通，教育部来电密准予紧急时迁往南郑或天水一带。”这一段话可以证明西迁至天水的动议。其中既有李、袁、张三人的建议，又有教育部的准许。但教育部的来电，更强调南郑，也就是南郑优先。学校总的意向看起来也是南郑优先。

再说第二种路线，像唐玄宗那样避难入蜀，进四川。这种意向很容易被理解，因为国民党中央政府已将重庆作为陪都，国家的优质资源不断在川蜀大地汇集。当此时，川蜀已集中了如中央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交通大学等一大批全国名校。时任附中数学教师的赵慈庚，在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曾有“传说目的地是

成都”的说法，“入蜀之说”应非空穴来风，它最可能表现为广大师生的一厢情愿。事实上，与西北联大成双峰之势的西南联大，后来也曾有过入川的打算，和其一起入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，之后就迁入四川李庄。但这种意向是不为国民党政府同意的，让西安临时大学立足西北是国家战略，不可能轻易更改。仅少西移也不可行，西安的安全形势不容临大这么做，因为不是长久之计。

再说唐德宗路线，迁陕南。这一动议，事先已有了工作基础。早在1937年12月1日，西安临大就向陕南凤县、留坝、褒城、南郑、沔县等县，派出了80余人的抗战宣传队。宣传队由董守义、吴祥凤、罗根泽、余坤珊、郭俊卿等教师带领，其中，董守义、郭俊卿是体育系教员，吴祥凤为医学院院长，罗根泽属国文系，余坤珊则为外国语文系主任。他们的工作除抗战宣传之外，还做壮丁训练、保安队社训军官体育指导等工作，时间长达两个半月。他们的来回，实际上起到了探路者的作用。



秦岭古道

城固位居汉中南部，北接秦岭，南依巴山，相对安全。加之气候温和，物产丰富，距离川蜀近，有能力又有需求接受几所大学的迁入。城固还有一个至为关键的吸引人的地方，已经有中央军校在此处勘定校址，但还未启用，临大可以紧急之需申请借用。以城固为中心进行布局，遂成为

定选。由此，临大不是西迁而是南移，驻守区域仍在西北。

二、有组织的迁徙——自西安至汉中的行军系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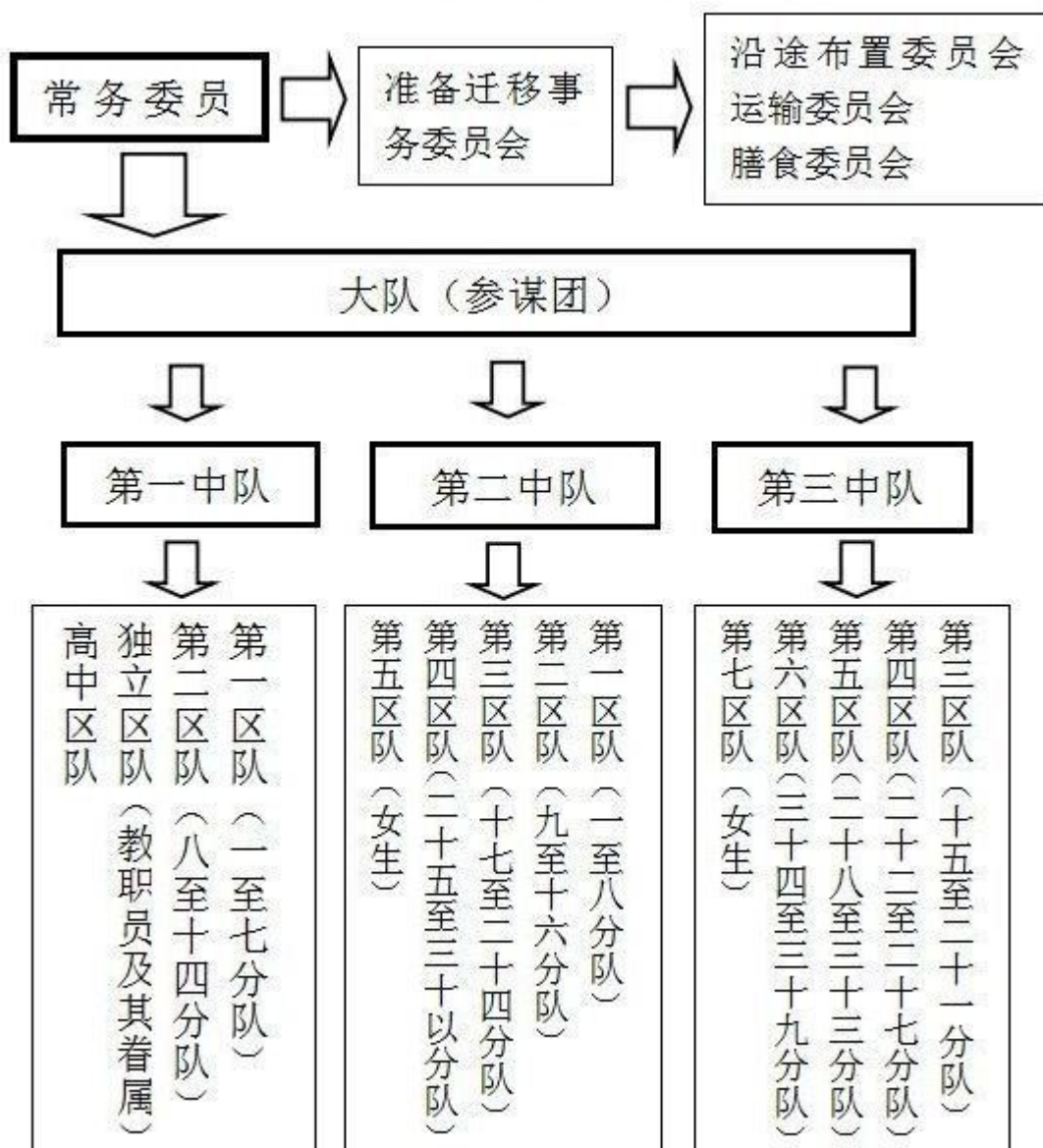
与自平津到西安的“自行前往”式的迁徙不同，自西安至汉中的迁徙则是有着充分的准备的。接到3月2日的南迁命令后，校方就全面启动了准备工作。3月9日的临大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成立17人的“准备迁移事务委员会”，下设布置、运输及膳食三个委员会。并拟成立“新迁校舍勘察及布置委员会”，推定李书田、袁敦礼、张贻惠、贾成章、杨立奎、许寿裳、黎锦熙、张汉文、董守义、刘锡瑛、

尹文敬、汪澜明、林几等人为委员。

按照“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全体学生由西安至汉中行军办法”，临大依照原有的军训组织，“编为一大队、三中队，十四区队，三十九分队（教职员及其眷属为独立区队，并高中区队、女生两区队，皆无分队）。”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，接续出发。中队的行军次序为设营组、侦察班、中队全部、医务组、运输组、收容班。每个中队配备安全员4人，荷枪实弹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；随行工友三至五人，听候中队长调遣。中队下面又分为若干区队，区队下面又设若干分队。大队、中队、区队、分队各自制作一面白角布旗，写明番号。整个行军队伍由徐诵明任大队长，李蒸任参谋长，其他校委员及院长组织成一个参谋团随军指导。每个中队的人数从500—600人不等，整个队伍规模近2000人。

战时运输工具非常缺乏，秦岭的路况又糟糕异常，物资和行李的运输是很困难的。原计划每个中队拨给胶皮大车15辆，装载粮食和随身行李，实际的情况是：车不够，驴骡凑。个人物品的集体运输规定：教职员每人物品的重量不能超过30斤；学生则以两人为单位自由组合，“一床被褥及个人之衬衣等合捆为一件，其重量不得超过四十斤。”多余的部分怎么办，个人想办法解决，主要靠自己手提和肩扛。

长途行军最基础的保障是给养，解决2000人的吃喝拉撒是大问题。行军办法有这样一段规定。照录如下：由膳食委员会在各站布置，每中队携带给养二天，由运输组给养班负责保管押运分配（每日三餐，中饭为馍咸菜）。由分队长于早餐后未出发前（或前一日晚饭时）向驻在地办理伙食人员领取该分队全部给养，转给同学，自行携带，早餐为稀饭和馍，晚膳为干饭及汤菜，均由舍营地办理伙食人员负责整理。如遇路途距离较远中途煮水由饮食班办理。



西迁行军路线图

三、行军过秦岭——跋山涉险与苦中作乐

一切准备就绪，迁徙随即成行。3月16日，西安临大师生离开西安，先是乘火车到宝鸡，19日开始翻越秦岭，中间经过黄牛铺、草凉驿、古风州、双石铺、南星镇、庙台子、留坝、马道，需要翻越秦岭、凤岭、酒奠梁、柴关岭，道长路险。教育学院王耀东老师率领200名师生，作为先遣队出发。4月4日，行军队伍全部到达褒城，19日抵达最终的目的地——城固。三段路程，由西安到宝鸡近200公里，宝鸡到褒城250多公里，再加上褒城到城固的距离，差不多500公里，千里行军名实相符。所用时间超过一个月，中间最艰难的路段用去12

天时间。

破屋秃垣与畜杂居。从宝鸡到汉中，所走道路是川陕栈道的北段，沿路城镇乡村皆穷困异常，俗称“穷八站”。所谓的站，是指客商一天的行程。为解决临时住宿的问题，行军大队事前派有前站，先联络各地的保甲长（相当于现在的村镇长），按站借用民房。偏僻地区的居民，面对突如其来的陌生人，大都抱有很强的防范意识，态度难免冷淡。但知道是教授、学生后，他们不仅喜出望外而且接待殷勤。受居住条件和接待能力所限，大家的住所难免是，“仰见星斗的破庙，三面敞开的戏楼，还有周仓脚前，古墓河滩。”所住各处，“亦不免有与猪为伍之叹。”“各中队所设通讯组，每晚以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消息，次晨以大纸书写张贴于外，不特各队队员得以明悉当日新闻，而各当地居民识字者亦多伫立围观。籍知现在国家大势。”把时局信息带进了偏乡僻壤。

锅饼咸菜汤粥做食。2000 人的吃喝问题如何解决？临行前，膳食委员会购得锅饼 8676 斤，咸菜 3000 余斤，先按照 1 人一天 1 斤锅饼 1 块咸菜分配。每到一市镇，将青菜、豆芽、豆腐、粉条等能带的食品都尽可能地收购一空。路途中每天的食谱如下：“早晨五点烧水、煮粥，中午在旅途中打尖，晚间食菜汤。”做饭用的锅灶，“锅是铁板铆成的敞口圆筒，口径二尺方，底径不足二尺。灶是铁圆筒，一侧留灶门，上缘凿气道，锅架其上。只能煮粥烧水。”租卡车一辆，“每天将末队的炉灶及厨师在晨饭后运往超前一站，再折回最后队，准备送下一班炉灶”，由于每天平均 20 公里的行走路程，还要手提肩背，自然饭量大增。“每当开饭前，职教员学生多已持箸碗环立鹄候，迨伙夫一声报熟，启锅分盛，无不食之津津有味。”

路途坎坷还遇劫匪。秦岭古道的难行，有“肩与碍巨石，十步三四却”之说。佟学海在“本校迁移行军沿途经过记录”中，曾有这样的描写，“过秦岭时适值雨后尚未放晴，道路泥泞，行步艰难，同行者觅取捷径，努力攀登，乃翻过一岭又逢一岭，层层重叠”，“沿路翠峰斜坡冻雪，白石横枕激流，所有景致依山路盘旋而随时变换，云雾低迷，人如行于雾上，雾逐人移，前后行人稍远即时现时隐”。穷乡险途往往治安不好。刘德润在“第二中队行军纪要”提到，“南去留坝马道，均系穷八站之尤者，土匪出没无常，本校同仁汽车在马道之南被截”。赵慈庚和王兆荷在回忆文章中对此都有细节性的描述，“在快到褒城县的前一站马道地方，

公路起伏难行，深山丛林中忽闻枪声，以为是猎户打猎，又连响两声，车停了，前面山岩上跳下几个花脸大汉，手持步枪，要我们全体下车，有几个人上车翻了一阵箱笼，有几人叫我们把带的钱全部扔在地上，如被他搜到，立即枪毙。……全车人都有损失，而王非曼教授损失最大”。期间，一名教师因路途劳累，抵达汉中后病逝。一名同学也因体弱，命终途中。



1938年，师生徒步翻越秦岭

辛苦自有抗战歌曲。行军路上，师生们既有跋山涉险的艰辛，也有团结向前、苦中作乐的精神。大家晓行夜宿在荒山僻野之中，甘苦与共，出入相顾，把这场苦难转化为“顽强的乐观精神”和“隐忍的坚定意志”。朱兰训在“秦岭行军”一文中，对此有着详细的描写，“当时虽然年轻，但心中却铭记一句格言：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所以也就化眼泪为悲愤。抗战！抗战！直到胜利，绝不罢休。”时为临大学生的刘艺民，回忆这段经历也充满激情，“‘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’。假使真有再大的雪，也阻碍不了我们的前进，因为我们有目的，抱着最后胜利的决心。”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这首战歌，“枪在我们的肩膀，血在我们的胸膛……”“工农兵学商，一起来救亡……”，都是天天唱。“蜿蜒的行军队伍，犹

如雄赳赳、气昂昂的赴敌之兵，震撼群山峡谷，趋退渺无人烟的寂静。”

这只是行军途中的几个片段，从中可见师生们的风发意气 and 乐观情怀。这种风骨和意态，使得物质贫乏成为了精神富足、路途险难充满了抗战激情。真正是：行军过秦岭，书生也豪情。想见古栈道，抗战歌曲声。 （魏书亮 白 媛）